

资本主义的三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何去何从

[韩] 金教诚

[摘 要] 福利国家是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前提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其演进历程中，福利国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进而陷入了一个周期性的缩减、适应与重组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然而，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正面临着“不平等加剧”“社会再生产困境”以及“生态危机”三大严峻挑战，新自由主义同样遭受了新的冲击与严峻考验。本文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三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从理念层面与政策层面出发，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同时，本文还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深层次驱动力，并以“去增长”理论为基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不平等；社会再生产；生态危机

一、引言

福利国家的兴起根植于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其基础在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和自由；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经济体系，其特征为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生产、分配及消费商品和服务以谋求利润最大化。在此体制下，资本家通过不断扩张积累财富，劳动者则依赖其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维持生计。弗雷泽（Fraser）深刻洞察资本主义，探讨了该体系中非经济背景的掠夺性分割界限，并将其概念化为“超越经济的维度”。^① 资本主义的演进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主义（16 世纪起始）到工业资本主义（18 世纪兴起），最终迈入了“福利资本主义”阶段（20 世纪开始）的转变。根据凯恩斯（Keynes）理论，福利资本主义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与阶级间协议，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缓解不平等的双重目标。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遭遇了“财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陷入了周期性的缩减、适应和重组。20 世纪 80 年代，出于对政府过度干预的反思，去规制、紧缩政策与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的自由放任主义重新崛起，福利国家亦随之依据“新自由主义”原则逐步转型。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简介] 金教诚，韩国中央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福利国家、比较社会政策。

[译者简介] 于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家庭政策。
本文由作者在第十八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主旨报告修改而成。

① 参见 Nancy Fraser,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 –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London: Verso, 2023.

尽管未有任何福利国家经历福利计划的激进缩减或解体，但无论右派还是左派政府，在必要时均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基调。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蔓延，以及个体在应对社会风险中的责任的强化，支撑福利国家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连带再分配及累进税制等理念与政策亦发生了显著转变。

本文聚焦于资本主义内生的“不平等”“社会再生产”与“生态危机”三大危机。当前，不平等的加剧深化了诸多社会问题，而社会再生产与生态危机则直接关乎人类存续的根基，即人力资源、社会关系及物质条件。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本质，与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家长制规范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危机。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章将回顾福利国家过往的财政危机及新自由主义作为替代方案的兴起；第三章深入分析三重危机的具体表现、发展趋势及其根源；第四章则从理念与政策双重视角提出应对策略，并剖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动力，最终提出基于“去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

二、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一）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危机

19世纪，欧洲和美国依托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经济政策框架，成功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此期间新增的财富并未实现均衡分配，而是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截至1910年，欧洲与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分别掌握了总财富的65%与45%，而前10%的富裕阶层则分别控制了90%与80%的财富。^①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分资本家的经济实力，但紧随其后的“狂热20年代”又见证了不平等现象的再度崛起。然而，这一趋势并未持久，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在“黑色星期四”遭遇断崖式下跌，正式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股市繁荣时期所累积的过度信贷最终酿成了泡沫的破灭，将全球经济拖入了深重的衰退与危机之中。^②

随着既有经济秩序的崩溃，一种旨在改变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新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即基于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指出，在失业率激增的背景下，政府若不积极干预，将会加剧社会恐慌。他主张通过扩大政府支出与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工资增长，进而激发总需求，并期待产生积极的乘数效应。^③凯恩斯在其著作《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深刻批判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并强调了国家强制性干预的迫切性与重要性。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全面接纳了凯恩斯主义的理念，着手建立“新政”秩序，这一变革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色关系，标志着政府开始积极运用其国家权力，以实现更为理想的社会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依托凯恩斯主义与组合主义的理论基石，开启了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此阶段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在此期间，福利国家通过强有

① 参见 Thomas Piketty, et al.,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udible Studios, 2014.

② Jason Hickel, *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 William Heinemann, 2017, 149.

③ Jason Hickel, *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 William Heinemann, 2017, 152.

力的工资谈判机制、适度的雇佣保护政策以及慷慨的福利制度设计，确保了合理的工资水平与社会福利的广泛覆盖。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保障了公民生活的平等性，而且通过有效扩大总需求，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其所需资金则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回馈与累进税制的实施。随着福利扩张、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良性循环机制的确立，不仅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促进，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大幅缓解。克鲁格曼（Krugman）将这一现象形象地描述为“巨大的压榨”，认为这是劳动、资本与国家三者间协议与妥协的产物，其基础在于公平分配、缩小差距的共识，以及这种共识对所有人均有利的信念。这种基于合作的多方稳定关系，使得自由、平等与团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然而，这一稳定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中遭遇了严峻挑战。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与高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能源价格的飙升推高了消费品价格，生产成本随之增加，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失业率也随之上升。此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因此受到了广泛质疑，关于其重组的讨论也日益热烈。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福利国家作为应对传统社会风险的主要体系，其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传统的共识结构也面临解体。相较于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福利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强调福利非生产性并假定两者存在冲突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兴起，成为具有现实适应性的主导性话语。^①

（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新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间逐渐取代了曾主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凯恩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正如哈维（Harvey）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它植根于强有力的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及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该理论倡导通过释放个别企业的自由与技能，力图将人类福祉推向至高水平。^②而哈耶克（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则指出，新自由主义以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为基石，从历史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进而构建了一种更为强化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旨在对抗集体主义与干预主义国家，捍卫自由市场的纯洁性。^③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通过去规制化、市场化、私有化以及财政紧缩等策略强化市场原则，并将国家的角色严格限定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的边界之内。^④格斯特尔（Gerstle）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战略进行了精炼的总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基本经济秩序。自由市场的构建与维护依赖于明确的私有财产权、交换规则、货币及信贷流通等制度，这要求国家在必要时进行适度的干预与调整。其次，将市场原则全面渗透至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关注“经济人”在劳动与工资交换过程中的行为，更将经济分析拓展至生产与消费之外，涵盖了家庭、宗教、政治等广泛领域，试图将人类行为的各个维度都纳入经济理性的讨论范畴。最后，复兴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承诺。新自由主义致力于赋予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与财富的自由，将这一思想体系塑造为一种具有解放性质的项目，旨在推动世界

① 김교성, “이 시대 ‘복지국가의 쓸모’?!” 비판사회정책, 2016, 52.

②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③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Text and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81-233.

④ Chantal Mouffe, *For a Left Populism*, London: Verso, 2019, 25.

向一个自由的经济交换体系转型。^①

1956年，美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名为“智利项目”的计划，旨在通过对大约100名智利经济学家进行系统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培训，以对抗当时盛行的发展主义理念。这一举措构成了有计划地将特定意识形态输出至他国的典型例证，其影响深远且引人注目。^②在智利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统治时期，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实践不仅是对该理论的一次实地试验，更标志着其开始掌握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新阶段。随后，在1979年和1981年分别上台的撒切尔（Thatcher）政府和里根（Reagan）政府，将这些原则进一步转化为放松经济规制和批判福利国家的理论武器。他们宣称，福利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直接后果，并将高税率、严格的市场监管、强大的工会势力和工资水平的上涨，以及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市场扭曲视为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们进一步主张，失业救济和社会救助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些现象；养老金和现金福利的提供则降低了储蓄率，导致“浪费性”的福利国家体系难以为继。为了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政府采取了放宽金融监管、减税、缩减工资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并在自由竞争的框架下推动经济增长。可以说，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那一刻起，其目标就直指削弱工会力量，并推动国家福利体系的倒退。这一系列政策与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引发了对于社会福利、经济自由与政府角色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与反思。^③

三、资本主义的三重危机

资本主义体系，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父权制及增长主义的深厚土壤之中，其持续扩张的动力源自对工资劳动的剥削、无偿劳动的占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掠夺。这一系列运作机制导致的后果是，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而生态环境的根基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一）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秩序取代凯恩斯主义后，被普遍视为“不平等”扩张的根源。在此体系下，“无劳动的增长”与“无工资的增长”导致资本集中收益，而工人阶级则陷入困境。随着国家再分配干预的减弱，分配结构持续恶化，两极分化态势加剧。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全球视角审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均日益凸显。过去30年间，基尼系数、收入十等分比和五等分比、占有率等衡量不平等的各项指标均证实了这一点。如表1数据所示，最顶层阶级攫取了收入和资产的绝大部分。不平等现象深刻影响社会各个层面，成为健康、犯罪、肥胖、青少年怀孕、社会排斥等诸多问题的根源。^④随着劳动收入分配率的下降，总需求缩减，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不平

① Gary Gerst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62-171.

② Jason Hickel, et al.,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Windmill Books, 2021, 180.

③ Jason Hickel, et al.,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Windmill Books, 2021, 188.

④ 参见 Richard Wilkinson, et al.,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等现象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①此外,不平等还导致民主退化、社会正义与公平受损、信任度下滑、国家认同危机等政治层面的“代价”。^②

表1 收入和资产占有率(以2022年为基准,%)

	欧洲		北美		东亚		世界	
	收入	资产	收入	资产	收入	资产	收入	资产
上层 1%	11.48	25.06	20.71	34.46	15.86	30.82	19.62	40.49
上层 10%	35.84	60.51	47.93	69.81	44.59	69.75	53.29	77.20
下层 50%	17.97	3.24	10.88	1.74	13.13	5.23	7.90	1.64

数据来源: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随着财富日益向资本家集中,不平等现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资本家为追求更高利润和资本积累,持续压缩工人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新自由主义政府则通过实施紧缩政策,助力资本家、大型企业与统治阶级进一步扩张其财富。这些政策通常包括抑制工资增长、放松市场监管、削减公共开支、为富人减税、降低公司税率、实施累退税制、上调利率以及延长劳动时间等。^③此类政策往往以提高生产力和所谓的“涓滴效应”为幌子,实则为富裕阶层提供了进一步积累财富的机会。财富与权力愈发集中于那些通过资产运作获取投机收益、地租、利息和资本收益的“不劳而获者”。^④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依然显著,阶级斗争亦在持续。然而,斗争的煽动者与胜利者往往是富裕阶级。面对工资停滞的困境,工人被迫接受剥削,承受牺牲并从属于统治阶级。尽管新自由主义未能实现其经济增长的承诺,但作为强化和充实资本的工具,其效用不容小觑。

(二) 社会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是指“通过人际互动、必需品供给及照护活动,以维系人类生存与社会联结的诸多实践形式”。^⑤此概念关乎生育后代及培养具备社会属性个体的重任,并为商品生产构筑了物质、社会及文化的基石,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⑥社会再生产危机主要表现为出生率低迷和照护危机。前者因人口减少而触发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难题;后者则源于照护需求激增与供给短缺所酿成的照护缺口及相关问题。然而,危机的本质并非单纯源于女性地位提升所带来的供需不匹配,而是资本主义结构性行为的结果,即拒绝赋予照护应有的价值,并对特定群体实施“遗弃”。因此,照护危机实质上是一种责任转嫁行为,旨在规避或减轻自身在照护劳动、成本及责任方面的负担。资本主义通过界定照护的正式与非正式、

① 参见 Anthony B. Atkinson,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参见 Joseph Eugen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③ 参见 Clara E. Mattei, *The Capital Order: How Economists Invented Austerity and Paved the Way to Fas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④ 参见 Andrew Sayer, *Why We Can't Afford the Rich*,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4.

⑤ Nancy Fraser,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London: Verso, 2023.

⑥ Cinzia Arruzza, et al., *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 London: Verso, 2019, 78.

公共与市场、男性与女性属性，进而推卸照护责任。国家限制其应承担的照护职责，将其转嫁给市场、私人领域或家庭，从而节省相关成本与责任，尤其将无偿家庭照护的重担强加于女性，并为男性的搭便车行为披上合理外衣。^①

照护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或资本主义结构内固有的父权制和性别压迫。^②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性别分工的历史，男性从事有偿生产劳动，而女性则承担无偿的再生产劳动。这种性别分工与各种文化规范相互交织，成为塑造我们生活的主导模式。^③由于再生产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其经济价值被抹除，重要性被掩盖、忽视乃至否定。再生产劳动被贬低为“浪漫化”的家庭琐事，并被推卸给“女性”。^④尽管再生产劳动为商品生产及有偿劳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强制女性或私人领域承担无偿劳动的形式，持续助长了男性的搭便车行为及女性的从属地位。

福利资本主义亦通过追求以标准化劳动者为核心的充分就业，为父权制家庭结构提供再生产活动的的环境。男性劳动者通过维持稳定就业及适当的家庭工资来供养受抚养者，而女性则负责家庭成员的照护。这凸显了性别不平等的福利国家之局限性。^⑤一方面，福利国家可被视为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承认斗争”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福利国家自始便伴随着对非劳动群体或从事未获承认的无偿劳动群体的忽视、歧视及排斥。^⑥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到来，有偿劳动的主体趋于普遍化，但女性却面临多样化的合同形式及有偿和无偿劳动的双重负担。随着家庭工资被“双职工家庭”规范所取代，社会再生产呈现出双重组织化的现象。对于具备支付能力者，社会再生产被“商品化”；而对于无力支付者，则通过“个性化”及“私有化”等方式加以应对。其结果是照护责任被转嫁给更为贫困的照护提供者，形成连锁反应，最终催生了“全球照护链”。^⑦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除特殊时期外，女性一直被视为照护劳动的责任主体。她们牺牲个人闲暇时间，将可用时间分配于有偿与无偿劳动之间。^⑧女性与男性在照护时间上的不均衡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其他领域时间配置的差异。总体而言，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涵盖有偿与无偿）较男性更长，然而，有偿劳动的绝对投入时间却相对较少，这直接导致了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相对收入的降低。^⑨对劳动（以货币计量）的有限投入，不仅影响了工资水平，更对职业发展构成了制约，成为“母亲轨迹”与“玻璃天花板”现象的主要诱因。当家庭内部出现照护需求时，女性往往将剩余时间全部投入无偿的家务与照护劳动。在这样一个不平等与性别分工交织的社会背景下，“低出生率”现象似乎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生计压力与照护负担的

① 강민영, 김교성, “복지국가가는 돌봄을 어떻게 위기하는가?,” 한국사회복지학, 2024, 76(2).

② 参见 Nancy Folbre, *The Rise & Decline of Patriarchal Systems*, London: Verso, 2021.

③ 김교성, 이나영, “젠더협곡을 넘어 젠더정의로,” 한국사회복지학, 2018, 70(2).

④ Cinzia Arruzza, et al., *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 London: Verso, 2019, 184.

⑤ 社民主义福利国家虽然发展了承认和补偿再生产劳动的制度，但集中于“去家庭化”，未能实现以“去性别化”为基础的性别平等。

⑥ 김교성, “이 시대 ‘복지국가의 쓸모’?!” 비판사회정책, 2016, 52.

⑦ 参见 Nancy Fraser,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London: Verso, 2023.

⑧ Sirianni Carmen, Negrey Cynthia, "Working Time as Gendered Time," *Feminist Economics*, 2000, 6(1).

⑨ Nancy Folbre, *The Rise & Decline of Patriarchal Systems*, London: Verso, 2021, 300.

加重,使得婚姻与生育成为许多人回避的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起,福利国家的总生育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①此后,部分欧洲国家扩大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生育率出现了一些回升与波动。然而,截至2022年,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仍维持在1.51左右。南欧与亚洲国家更是持续保持在1.4以下的超低生育水平,而韩国2023年的总生育率更是惊人地低至0.72。^②

(三) 生态危机

人类始终以多元化的方式对自然界施加着深远的影响。从狩猎采集时代迈入农业革命后,人类不仅缔造了璀璨文明,还筑起了城市,催生了国家的诞生。及至工业革命,随着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应用,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急剧攀升,标志着人类活动步入了一个危险的加速阶段,此即“巨大的加速”。经济增长、全球化浪潮、城市化进程、消费扩张等诸多标志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均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土壤氮含量激增、大气甲烷浓度上升、南极臭氧层受损、地表温度攀升、气候异常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热带雨林遭到破坏、沿海地区面临崩溃等环境问题亦接踵而至。自2007年起,科学界启动了跨学科研究,旨在界定生态变化的临界阈值,并公布了九项“地球界限”指标,以监测地球状态并维系其稳定性。^③2009年研究成果发布时,仅有三个领域突破了临界值。然而,至2015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淡水氮磷超负荷等领域均已越界,步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国际社会讨论最为热烈的危机领域当属“气候变化”。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已上升1.2℃,洪水、干旱、酷暑、严寒等极端气候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苦难。气温升高与化石燃料使用及温室气体排放紧密相关。截至2019年,按人均年“碳足迹”计算,北美(20.8吨)、欧洲(9.7吨)、东亚(8.6吨)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6吨),而拉丁美洲(4.8吨)、南亚和东南亚(2.6吨)、撒哈拉以南非洲(1.6吨)则相对较低。^④为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中设定的2℃和1.5℃的温控目标,每人每年碳排放量应分别控制在3.4吨和1.1吨以内,但多数国家已超出这一可持续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间碳排放量的差异小于国家内部排放量的差异。尽管各大洲间存在差异,但北美、欧洲、东亚的高收入群体(排名前10%)分别排放73吨、29吨和39吨,与低收入群体(排名后50%以下)的排放量形成鲜明对比。围绕有限资源的争夺,社会矛盾与纷争在所难免。^⑤

生态危机,作为一种超越地球历史全新世(Holocene)范畴的异常现象,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生态系统将难以复原至先前状态,并可能通过与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而引发累积性影响。因此,生态危机被视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新型社会风险”,并已演变成为社会危

① 류아현, 김교성, “젠더평등과 출산율의 관계에 대한 실증,” 여성연구, 2022, 112(1).

② 参见 OECD, *Trends in Total Fertility*, <https://stat.link/ofa9z6>.

③ 涵盖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层破坏、海洋酸化这三大关键议题,同时亦涉及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变、淡水资源的枯竭、生物多样性的显著下降、氮磷循环的失衡及其污染问题,以及海洋酸化的加剧、大气污染与气溶胶负荷的上升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当前全球环境领域亟待解决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④ 参见 Thomas Piketty, et al.,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udible Studios, 2014.

⑤ Lucas Chancel, et al.,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World Inequality Lab, 2022.

机。^① 地球生态的可持续性危机之所以如此严峻，是因为它直接威胁到现代文明的维系以及人类未来的生存与物质基础。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样深植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财富积累，无差别地掠夺和侵占自然资源与公共财富。^②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通过污染大气、水质和土壤来破坏环境，同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从而构建了一套支撑增长的体系。即便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资本主义也通过将生产和消费活动扩展至全球范围，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尽管“人类世”（Anthropocene）理论为理解生态危机提供了直观的视角，但它将人类整体视为危机的主要责任方，忽视了权力关系和不平等问题，将人类简化为一个同质的整体。^③ 然而，在掠夺环境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和阶级的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平等。工业革命由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主导，因此危机的主体和责任也因阶级而异。^④

如表 2 所示，资本主义的三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平等危机是“阶级”问题的体现，源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尽管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剥削的方式和强度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再生产危机则与“性别”问题紧密相连，在父权制和性别分工的背景下，从事生产劳动的男性往往依赖或“搭便车”于被迫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女性。而生态危机，包括气候危机、碳排放、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以及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为应对剥削、搭便车和掠夺问题，人类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和培养新的生活态度。生态危机的影响分配不均，不平等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再生产危机。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在于统治阶级，而再生产危机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减少不平等可能是克服再生产危机、减轻生态压力的有效途径。

表 2 三重危机的表现

危机	问题	主体	对象	形态	观念体制
不平等	阶级	资本家	劳动者	剥削	新自由主义
社会再生产	性别	男性	女性	搭便车	父权制
生态	环境	人类	自然	掠夺	增长主义

四、资本主义危机的替代方案

（一）旧有秩序已逝，新秩序尚未成形^⑤

在过去的百余年间，福利资本主义的演进伴随着两种核心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这两种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层面，包括核心理念、理论框架、政策组合、话语

① Gough Lan, "Climate Change, Social Polici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2014, 29(3).

② 参见 Jason W.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5.

③ 参见 Erle C. Ellis, *Anthropocen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 参见 Raj Charles Patel, et al.,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 A Guide to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⑤ 格兰西（Gramsci）在 20 世纪初大危机中用来象征历史性危机局面特征的格言。弗雷泽（Fraser）以相同的标题出版了著作。在这里，“旧”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时代。

策略、霸权结构以及世界观等诸多方面。一种意识形态为凯恩斯主义，它奠定了美国新政秩序的基石，并与欧洲的社民主义思想相融合而发展。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以契合公共利益。该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崭露头角，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再度复兴，而至20世纪70年代则逐渐式微。另一种意识形态则是新自由主义，其旨在解构所有既定秩序。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从政府的规制与控制中解脱出来，以拓展自由空间。该思潮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兴起，于20世纪末达到鼎盛，但在21世纪初期开始呈现瓦解之势。^①

多数政治学者及哲学家均认为，新自由主义秩序在21世纪初已告解体。他们聚焦于由普通市民引领的多元化广场政治现象，并主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冠疫情前就已陷入崩溃。^②当旧有秩序已逝，而新秩序尚未成形时，我们或正步入一个多元霸权竞相角逐的时代。下面对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前行的新意识形态前景进行一番总结。

弗雷泽提出，资本主义的霸权是通过融合“正义（Justice）”与“正确（Right）”两个维度构筑的。这在他所提出的“视角二元论”中，分别对应着“分配”与“承认”。分配层面涉及经济结构与阶级分裂等层级问题，而承认层面则聚焦于社会中的尊重、尊严、归属感等地位秩序。在分配维度上，资本主义可划分为“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或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平等的分配体系，追求以市场为核心、全球化与金融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承认维度上，则分为“进步”与“反动”。进步的承认政治涵盖了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多文化主义、生态主义等自由主义新社会运动的斗争。基于这两个维度，资本主义霸权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阵营（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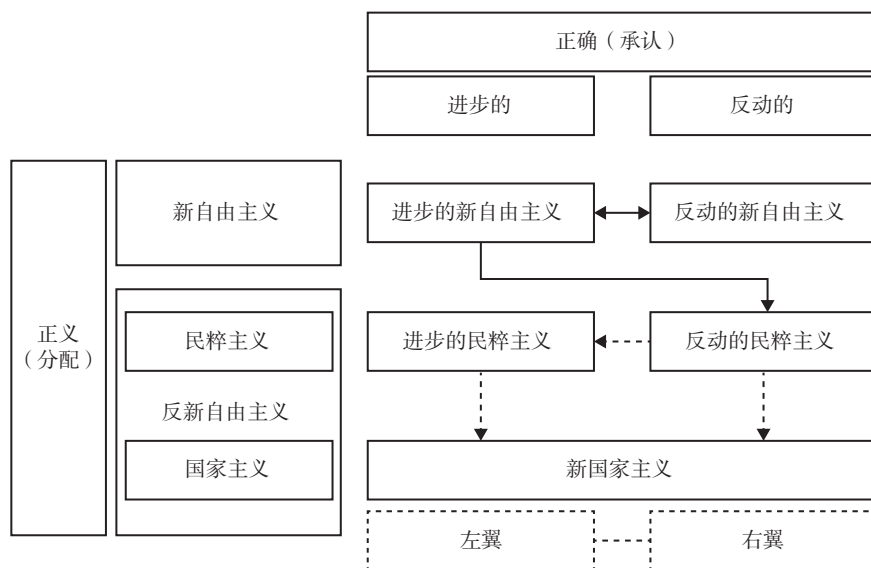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主义霸权的更迭

① Gary Gerst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0.

② 也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尚未展现出转型的明确契机。Dardot 等人针对“旧有秩序已然消逝”的论断，提出了以下几点有力反驳：（1）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凯恩斯主义再度被寄予厚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阶级关系并未能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2）右翼民粹主义政权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其本质上并未显著偏离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基调与核心理念；（3）当前活跃于社会舞台的各种广场运动，其政治诉求与行动方式并非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变革力量的崛起，而更可能是通过激化不同群体间的冲突与对立，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策略与变种形式。

一般而言，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时期，实则是进步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进步新自由主义者不仅成功推动了放松规制、私有化、自由贸易及福利削减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举措，还广泛吸纳了其他非经济性解放诉求。^①他们一并追求性别正义、性少数者权利、多文化主义及生态主义等多元平等主义议题与理想。克林顿（Clinton）与布莱尔（Blair）便是此时期的代表性政治人物。而他们的政治对手，则是融合了新自由主义分配政治与反动承认政治的“反动新自由主义”。这些反动新自由主义者，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却固守父权制、种族主义、反移民及亲基督教等保守地位秩序。^②随着进步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执着追求，社会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政治自由主义的诸多方面亦遭受逐步侵蚀。左右政治势力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政权更迭的轮回中，公民行使真正民主权利的可能性被不断剥夺。民主价值的沦丧宣告了“去政治化”时代的来临。^③作为对精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及中立共识的抗争平台，广场政治应运而生。21世纪初，更是开启了所谓的“民粹主义”精神时代。

对以精英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否定，依据其承认政治的倾向，分化为反动（右翼）与进步（左翼）民粹主义。这两者在公共领域边缘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分别拥趸种族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权威主义者特朗普（Trump）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Sanders）。特朗普以其排斥性言论，以种族主义、厌女情绪、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及反移民立场为基石，成功吸引了白人、异性恋者、男性及基督教徒的广泛支持。^④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第45届美国总统，此显著成就似乎预示着“反动民粹主义”时代的开启。与此同时，领导英国脱欧运动的约翰逊（Johnson）、意大利大选中的胜者萨尔维尼（Salvini）以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Bolsonaro）等，均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期，欧洲与南美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便已开始崛起，它们通过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致力于民族主义的复兴，并追求以“沙文主义”为核心的共同体主义及强权国家理念。桑德斯的呼吁不仅涵盖了劳动者，更广泛地包括了女性、移民、有色人种等多元群体。诸如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赋权公民运动（Empowered Citizens Movement）、愤怒公民运动（Indignant Citizens Movement）以及不屈夜晚运动（Nuit Debout）等广场政治活动，均以平等主义为基础的左翼民粹主义为根基。随着桑德斯与科尔宾（Corbyn）的崭露头角，欧洲涌现了“我们能党”（Podemos）、不屈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等激进左翼政党。这些政党作为对新自由主义及不平等的反动力量，积极倡导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在全球化及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背景下，右翼与左翼均出现了反动运动，其中右翼怀念往昔部分人受保护的旧秩序，而左翼则致力于全面扩大公民权利。

① Nancy Fraser,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From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to Trump and Beyond*, London: Verso, 2019, 20.

② Nancy Fraser,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From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to Trump and Beyond*, London: Verso, 2019, 24.

③ Chantal Mouffe, *For a Left Populism*, London: Verso, 2019, 32.

④ Nancy Fraser,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From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to Trump and Beyond*, London: Verso, 2019, 31.

弗雷泽主张将平等主义的分配原则与非等级的承认理念相融合,以构建一个旨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民粹主义”霸权集团。这一观点与墨菲(Mouffe)所提出的“左派民粹主义”不谋而合,后者同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对抗性秩序。他着重强调,为了克服左翼政治的无能状态及阶级本质主义的局限,必须在针对各种从属形态的斗争中构建起等价链,并采取“民主激进化”的战略。所谓民主激进化,指的是在“自由民主制度”框架内,为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而进行的激进化进程。^①这一策略涵盖了环境保护、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对抗所有形式统治的斗争。它高度重视对现有制度的批判以及民主程序的运用,并必然涉及反资本主义的层面,因为其认为各种形式的压迫均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②然而,由于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它与战后社民主义秩序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凯恩斯式的增长模式被视为环境破坏的核心动因,因此,若不终结这一增长模式,民主激进化的愿景便无法实现。这就要求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与生态主义的斗争相结合,同时涵盖生产和再生产层面所发生的斗争。在此背景下,再分配与平等、性别正义、生态转型有望成为后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核心要素。

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右翼民粹主义崭露头角,然而它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愿景。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有迹象表明,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暂时退潮,新自由主义中间派有所回归。在各种观点与替代秩序相互对立的过程中,新冠疫情后一个主导公民安全与保护的强大国家形象浮出水面。杰尔鲍多(Gerbaudo)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将“尚未到来的新事物”定义为“新国家主义”。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强大国家的“巨大反击”已在民粹主义时期初现端倪。以种族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反动民粹主义追求一个退化且威权的国家形态,而进步民粹主义则同样以积极的国家干预为基础。新自由主义作为市场的审判者,也强调积极国家的角色。随着干预主义国家的回归,新国家主义正逐渐崛起为新的元意识形态。^③在过去的100年里,资本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通过历史周期的概念不断演变。

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存在着多样化的评价,达尔多(Dardot)等人所提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在本质上与进步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以及新国家主义的核心主张并无显著差异。为准确传达其深层含义,以下是对原文的提炼转述:

“针对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诸多冲突,核心应对策略应聚焦于争取平等与民主自治的斗争。为避免人民群众间的分裂,新左翼力量不应将追求社会平等的斗争与以女性、民族、种族、性少数群体及不同世代等为核心的具体斗争相割裂或对立。换言之,斗争不应被简单划分为经济斗争与文化斗争两个阵营,而应统一为旨在实现平等的社会斗争。工会主义、生态主义、替代全球化主张、女权主义及反种族主义等多元斗争主体,应相互承认各自斗争的正当性,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斗争实践中,从而具体且全面地整合平等斗争的各个方面。”^④

(二) “去增长”与政策组合

墨菲对威权主义政治格局提出了深刻批判,并创新性地引入了“绿色民主革命”这一全新

① Cas Mudde, et al.,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7.

② Cas Mudde, et al.,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0.

③ 参见 Paolo Gerbaudo, *The Great Recoil: Politics after Populism and Pandemic*, London: Verso, 2021, 12.

④ 参见 Pierre Dardot, et al., *Le choix de la guerre civile: Une autre histoire du néolibéralisme*, Lux Éditeur, 2021.

话语，旨在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及生态领域的多重危机。她积极主张捍卫因金融资本主义侵蚀而日益恶化的物质基础，力推“绿色新政”，并呼吁进行彻底的生态转型。这一系列主张旨在将阶级斗争、性别斗争与生态主义斗争紧密结合，从而强化左翼民粹主义的战略地位。受到罗斯福新政的深远影响，绿色新政强调政府应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改善环境状况、重振经济增长并缓解社会不平等，同步实现生态、经济与发展的多重目标。

然而，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及环境负担的加剧。有学者指出，所谓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可以脱钩的观点实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摆脱对发展主义的盲目狂热，唯一途径便是“去增长”，这一理念要求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本质，深刻反思发展、资本主义及工业主义。它倡导减少生产与消费，强调资源共享与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旨在通过大力重组国民经济，缩减特定产业与生产规模，以摆脱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束缚。^①这一愿景旨在在生态领域内追求基于团结的新生活方式，期待实现“更加平等的社会”。有学者基于生态主义、反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深入探讨了去增长运动的共同原则、相关政策及变革策略；有学者更是提出了包括经济民主化、再分配、技术民主化、劳动再评价、生产与消费领域的解构以及国际团结在内的六大政策组合。^②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于再分配与劳动领域，进一步剖析这些政策组合。为限制富裕阶层的财富过度积累并减少其碳排放，有学者建议设定收入与财富的最大上限，并对收入、利润及财富实施更为严格的累进税制。^③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富人通过垄断经济发展成果，并利用政府的紧缩政策及税率调整，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财富地位。因此，有必要提高针对富人的税率，回归至对金融进行严格监管的新政时代。

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提议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和全民基本服务（UBS）的政策构想。该政策力主医疗、教育、照护、文化、交通等服务的去商品化，通过重新分配富裕阶层的资源来提供基本收入，并将基本物品的获取确立为一种社会权利。基本收入的合理性源自共享财富的理念，即每个人对自然共享财富与人工共享财富均享有平等份额。基本收入不仅是一项政策举措，更是一种深邃的观点与理念，激发人们去构想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并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实践而存在。它以全新的视角对劳动伦理与家庭伦理提出挑战，探索当前乌托邦式愿景的可行性。^④基本收入通过减少对劳动的过度依赖，强化了人们的经济独立与自主性，并为推动性别正义与实质性自由的扩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劳动改革则致力于消除“无意义工作”等有害活动，推动优质工作与劳动的共享，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并重新评估与赋予照护劳动应有的价值来实现其目标。在一个过度崇尚劳动的社会中，缩短劳动时间意味着将剩余价值从资本手中再分配给劳动，从而减少不平等现象。此举将

① Giorgos Kallis, et al., *The Case for Degrowt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33.

② Mattias Schmelzer, et al., *The Future is Degrowth: A Guide to a World Beyond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22, 30.

③ 参见 Jason Hickel, *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 William Heinemann, 2017.

④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9.

降低生产与消费水平，促进体面工作的共享，减少碳排放，并为人们腾出更多自由时间。^①事实上，对时间的争夺一直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核心议题。^②凯恩斯曾预言，到2030年，他的后代每周仅需工作15小时，即每天工作约3小时，便能从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维克斯(Weeks)在探讨去劳动化议题时，提议实施每周30小时、每天6小时的工作制度，同时保持收入不变。^③通过缩短劳动时间与提高工资水平，人们能够掌控更多时间，并意识到将时间投入更为愉悦事物上的可能性。^④

在劳动时间的计算中，应充分纳入无薪照护劳动。重新审视照护劳动的价值，旨在基于社会成员均为照护者的身份认同，追求共同承担照护责任的“普遍照护提供者模式”。为了扩大正规照护的规模，保持公共照护生产的高比例，激励男性参与照护工作，并消除照护提供者所面临的不利影响，需要构建全新的制度安排。^⑤这些政策组合都是为了扩大个人的实际自由，使平等参与成为可能，从而实现一个公正未来。

The Triple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eoliberalism

[South Korea]Kim Kyo Seong

(Chung-Ang University, Seoul 06911, South Korea)

Abstract: The welfare state has developed on the du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Over its trajectory, it has inevitably faced the financial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herent to capitalism, leading to a cyclical process of retrenchment, adapt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Neoliberalism emerged as a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rapidly gaining prominence as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However, the current capitalist system now confronts three profound crises: widening inequality, difficulties i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Simultaneously, neoliberalism itself is experiencing mounting pressures and undergoing serious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hree crises within capitalism, investigates their root causes, and proposes responses from both ideological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it delves into the underlying forces sustaining neoliberal ideology and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formed by the theory of "degrowth."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welfare state; inequality; social reproduction; ecological crisis

(责任编辑: 华 颖)

① 参见 Kyle Lewis, *Overtime: Why We Need a Shorter Working Week*, London: Verso, 2021.

② 在20世纪初期，缩短劳动时间不仅是劳动运动的核心诉求，更是工人团结一致的重要基石。然而，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选择将创造就业机会置于优先地位，而非推进劳动时间的缩短。自此以后，关于缩短劳动时间的进程便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③ 基本收入弥补因缩短劳动时间而减少的收入。

④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1.

⑤ 강민영, 김교성, "복지국가에 돌봄을 어떻게 위기하는가?", *한국사회복지학*, 2024, 76(2).